

江苏文艺 研究与评论

江苏省文联创作研究部 编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3期

J206.7

1334(201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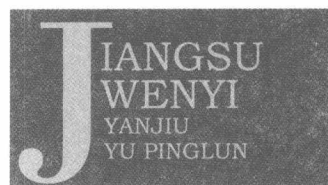
NUAA2013060826

I206.7
1334(2011)-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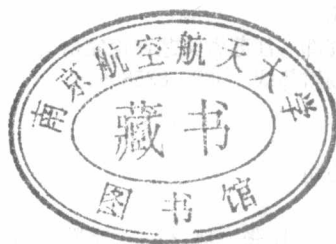
201

第3期

江苏文艺 研究与评论



江苏省文联创作研究部 编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0608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江苏省文联创作研究部,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305 - 08209 - 2

I. ①江… II. ①江… ②江…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②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99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
编 江苏省文联创作研究部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责任编辑 胡小红 编辑热线 025 - 83580609

照 排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文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63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8209 - 2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446164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3580302105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慧芬

副主任

叶飏荣 丁 帆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贵民

王 尧

刘伟冬

何言宏

周安华

晁岱健

温潘亚

缪小星

主 编

付少武

副主编

吴 嫔

目 录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 | | | |
|----|--|-----|
| 1 | 革命的文人与文人的革命
——辛亥革命中的南社人 | 李继锋 |
| 18 | 用纪录片讲述辛亥革命中的南京
——访电视历史纪录片栏目《风云百年》文史总策划李继锋教授 | 吴 伟 |
| 26 | 推拉摇移升《知音》 | 张永祚 |

理论前沿

- | | | |
|----|-------------|-----|
| 37 | 文艺批评二题 | 黄毓璜 |
| 45 | 中国传统吉祥幸福观阐释 | 沈利华 |

艺术论坛

- | | | |
|-----|--------------------------------------|-----|
| 57 | “60 年代生”及对应的文学气质——毕飞宇论 | 杨 扬 |
| 65 | 国粹与国人 | 晁岱健 |
| 70 | 走传承发展创新之路
——谈倪派唱腔形成的艺术轨迹 | 孟文井 |
| 75 | 大师的光辉
——试论刘海粟与陈之佛的花鸟画创作 | 丁 涛 |
| 82 | 于画书诗三绝外 冶金玉石一炉中
——女金石书画家谈月色的生平与成就 | 徐 畅 |
| 99 | 论文字内容与书法创作 | 叶鹏飞 |
| 106 | 从苏轼政治生涯看其书法风格的嬗变 | 崔慧娴 |
| 115 | 情欲叙事、历史意识与人性书写
——以江苏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为例 | 周根红 |

- 125 从“警匪片”到“公安片”、“公安剧” 彭耀春
——新时期关于警匪片的类型研究和警察影像创作重心的位移

- 134 传于固守,美在绵延 陈 洁
——论流派传承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摄影专题

- 142 关注摄影理论和实践问题 繁荣发展江苏摄影事业 沈 遥
145 摄影的意义与价值 孙 慨
154 数码时代关于纪实摄影的思考 谢 白
159 民俗摄影的技法及形式研究 刘 冻
167 当代中国摄影史研究状况述评 汤天明

艺苑履痕

- 174 中层干部群体中的“这一个” 陈 辽

获奖论文

- 179 现实主义精神与中国画的广阔前景 马鸿增
186 学术的尊严与艺术的独立 薛龙春
——谈沧浪书社对中国书坛的意义
191 莫把“愚乐”当“娱乐” 刘世敏 宋丽平
——浅谈电视传媒娱乐化的迷失

文联建设

- 195 关于推进基层文联建设的思考 王慧芬
199 江苏省文联文艺品牌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
江苏省文联文艺品牌课题调研组

他山之石

- 205 浙江省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经验 邵 杨

文艺动态

征稿启事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革命的文人与文人的革命

——辛亥革命中的南社人

李继锋

【摘要】 南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文学社团。反清是社员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在辛亥革命中,南社社员不仅在舆论界独占鳌头,在实际革命斗争中更是独占鳌头,像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陈其美、黄兴等人的名字是当时最为闪亮的。他们都是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革命党领袖。在这场流血并不特别多的革命中,南社社员的笔墨鼓动发挥到了极致,而在这场结束千年帝制的革命中,南社社员的剑也异常的锋利。言与行的高度合一,群体内部的高度认同,促成了革命的迅速成功。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建立、南北统一,南社的事业和影响达到了高潮。

【关键词】 南社 辛亥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

一、南社与同盟会:历史渊源及关系模式

1906年7月20日,上海吴淞口外停着一艘邮轮。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就在这条船上。从日本出发前往南洋,虽然途经上海海域,却不能踏上故国的土地。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不过一艘没有篷的小舢板船载着4位客人接近了邮轮。他们是同盟会江苏省分会支部长高旭及三个同盟会员陈陶遗、朱少屏、柳亚子。他们是从租界巡捕房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孙中山约见他们的通知。

柳亚子在《回忆残稿》中提到了这次会见,见到传说中的革命领袖,他当时过于激动,加上口吃,结果没有说上几句话。他遗憾会面之时自己没有给孙中山留下强烈的印象。

柳亚子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直铭记于心。3年之后,他和上海金山人高旭、江苏吴江人陈去病发起建立了南社。朱少屏、陈陶遗也是南社的重要

成员。南社和同盟会有着天然的联系。南社的3位发起人都是同盟会员、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柳亚子称南社建立之初最有影响力的发起人陈去病是一民主义,即偏向民族主义,称另外一位重要发起人高旭是二民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外加民主主义,而柳亚子自己是纯正的三民主义,除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之外,还外加信仰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生主义。他写道:“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①这段话,柳亚子点出了当时南社社员的政治意识的真面目,其实也点出了国民党人的普遍思想状况。

南社于1909年11月正式诞生于江苏苏州的张公祠,包括陈去病、高旭、柳亚子3位发起人在内的17位文人书生参加了在苏州虎丘的雅集,其中14位是同盟会员,也就是革命者。南社承继明代东林党、复社、几社的文人结社的精神和形式,以诗文唱和形式聚集,是很松散的文学社团组合。

南社成员有着传统士大夫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政治上倾心反清或者有革命倾向,他们雅集聚会是以传统文化的精髓诗文来联络志同道合者,以气节相标榜、文章相砥砺、诗词相酬唱。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诗歌文章本身的探讨,同样热衷于反清思想、人权思想、民主共和思想等内容的表达和交流。

南社成立之后,成员在短短数十年间增加到一千多人,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的精英。南社的出现和迅速壮大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也就是晚清的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多半源于文人和士大夫,国学基础深厚,在他们的身上中西文化正在融合,他们与传统士大夫在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上有相似之处,这也是南社诸人能够迅速影响和控制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关键:他们是旧制度的反叛者,但熟谙旧时代的运作方式和思维习惯,凡事能够驾轻就熟。

南社从创立伊始,就和同盟会是天然的盟友。南社的3个发起人中,高旭是江苏同盟会支部长,同盟会成立时就加入的首批会员。陈去病和柳亚子两人于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1909年虎丘首次雅集的17名南社社员中,同盟会员就多达14人。同盟会员在南社中占比例极高的情形此后数年内一直在延续。

1911年武昌起义前南社第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园杏花村举行,到会者34人,同盟会员27人。到1912年3月举行第六次雅集时,到会者40名中有34名是同盟会员。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因为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普遍受过经典教育,他们是革命者,但仍然残留着传统书生的情趣和审美习惯。南社如同

^① 柳亚子:《自传》,《珊瑚》杂志第13期。

盟会里的中国古典文学俱乐部,它本身和同盟会之间没有任何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至今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乃至后来参加过南社的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对南社直接发号施令过。

二、南社内部的“革命”

1909年,南社首次在虎丘雅集的时候,曾经通过《南社条例》,规定每半年雅集一次。到了1910年春,陈去病等着手准备南社的第二次雅集,雅集的地点选择在浙江的省会杭州。柳亚子点出了将雅集放在杭州举行的原因是因为陈去病当时在南社内最有影响力,他写道:“这一年,巢南是在杭州蒲场巷高等学校教书了。第二次雅集所在地,照例是应该在及时雨大哥驻扎的山头上举行的,所以决定地点是在杭州。”^①

1910年4月10日,正逢初春踏青时分,前来杭州雅集的南社社友们聚餐、合影,还坐了西湖的老爷船在湖上泛舟。在湖光山色中,忧国忧民的他们回归了骚人墨客的本来面目。晚上,他们到了聚丰园饭店开怀痛饮,就像柳亚子自我解嘲的,一般社友们“宿酒未醒,加以新醉,文人雅集,如是而已”。他们大部分是反满的革命者、追求共和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字的顶礼膜拜者,在他们的身上留存着中国传统名士的深深印记,品味美酒,寄情山水,同时吟诵反对清廷的诗篇,他们乐在其中。

通观南社数十年雅集的历史,这次杭州的雅集称得上是南社内部最为融洽也是气氛至为轻松的聚会。只有一位社友非常郁闷,他就是匆忙赶路,却误了杭州雅集之期的高旭。此后长达10个月之后,作为南社的3个发起人之一,他才第一次得以参加在上海愚园举办的第四次雅集。但1911年初的愚园雅集的气氛和杭州的雅集相比,却让参与者嗅出了些许火药味。

历史已经跨入1911年,也就是中国的农历辛亥年。辛亥年以一场成功颠覆帝制的大革命而永载史册。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诞生之后,革命思潮已在国内知识界潜滋暗涨,渐成时尚,有了革命的文人才催生南社这样鼓吹革命的文学社团。在准备革清廷之命的同时,在还稚嫩的南社内部也发生了一场权力转移的“革命”。

来自苏州吴江黎里镇的柳亚子是这场“革命”的主角。他直言不讳地写道:讲南社的历史,倒有一部分是“内讧”的历史。所谓“内讧”也不一定和思想的斗争有关,甚至于只是些个人意见的争持罢了。

1910年8月16日,南社于上海张家花园举办第三次雅集,19个南社社员

^① 柳无忌:《柳亚子文集》,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前来聚会。

会上选举的诗选编辑员是景耀月(民立报馆),文选编辑员是宁调元(北京帝国日报馆),词选编辑员是王无声(神州日报馆)。在虎丘雅集上当选的文选编辑员陈去病、诗选编辑员高旭都落选了。在南社的职员中,他们担当的职务最为重要。

这种权力转移的局面是南社3个发起人中最为年轻的柳亚子蓄意促成的。这个自负的青年策动了一场自鸣得意的“张家花园革命”,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变”,柳亚子的目的是要将南社的社务,特别是《南社丛刻》的编选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柳亚子对这场悄然的“革命”颇为自豪,他甚至记载了这次“革命”幕后策划的内幕。他这样写道:“革命军的马前卒,当然是我,而神机军师,则是太仓俞剑华。我们这一次的革命策略是很巧妙的:我们先主张第三次雅集的地点要在上海。巢南在杭州教书,他守着老营,不来上海,而天梅是照例不到的。”^①

在南社,陈巢南,也就是陈去病,是第一号人物,高天梅,也就是高旭,是第二号人物。柳亚子在南社建立之初,对陈去病、高旭两位颇为尊敬,他把陈去病比做及时雨宋江、高旭比做玉麒麟卢俊义,而自比为小旋风柴进。但前两期《南社丛刻》的编辑让他对这两位产生了不满的想法。

《南社丛刻》的前两集编辑工作分别是高天梅和陈去病编辑的。而事事追求完美的柳亚子觉得他们的编辑思路不够合理,名士风度过重,具体做事的时候很马虎,影响《南社丛刻》的质量,就开始酝酿一次内部的“革命”,改革《南社丛刻》的编辑体例,将编辑的权力从陈、高两位的手中转移过来。在张园的雅集上,乘陈去病和高旭两人没有参加,柳亚子和几个年轻人大胆而巧妙地发动了一场“革命”,将两位发起人边缘化了,使他们在诗词文的选择、编辑方面,也就是南社的事务方面失去了主导权。“政变”成功的柳亚子很开心,也很尽责,在俞剑华的帮助下,他很快将《南社丛刻》第三集编辑出来。

柳亚子这个悄然“革命”的做法最终瞒不过陈去病和高旭,被突然边缘化的陈高两人当然并不开心,不过陈去病对柳亚子相知甚深,没有深究。心高气傲的高旭则决定予以反击。

1911年2月13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四次雅集。上海愚园,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当年却是南社人最钟爱的雅集去处。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周祥骏等一共到会34人。每次雅集,交谈、赋诗、合影、晚宴,已经成了惯例。在酒席上,高旭对柳亚子上次雅集时的“革命”行动耿耿于怀,便“大闹其酒阵”。柳亚子概略地提及了他和高旭之间带有火药味的语言交锋。他描述了当时

^① 柳无忌:《柳亚子文集》,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的情景：“照顺序单所规定的，午餐，收雅，摄影，报告，补收入社书、入社金，谈话，一幕一幕做下去，压台戏自然是大庆楼的晚宴了。记得天梅和我大闹其酒阵，座中也很分左右袒，却是我的方面人多，还有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张佚凡女士也出马相助。于是我哈哈大笑，说道‘得道者多助’呢。这句话，谁知道又种下了后来高柳破裂的根苗。”^①

午膳后开会，由柳亚子介绍新入社的社友，其中一位名为范鸿仙，他是安徽人，当时在《民立报》馆工作。这家报馆与南社关系密切，事实上，它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报馆办在上海，它是革命党人宣传和鼓动革命一大利器。

三、南社人与革命思想的宣传

《民立报》馆内，不仅范鸿仙是南社的社员，《民立报》的社长于右任也早已经是南社的社员。他参加过南社社员的临时雅集，只不过没有填写入社书而已，他的入社号是“六五”，和其他成员所用的小写阿拉伯数字有所不同。

1909年5月，《民呼日报》在上海租界创办。宣布“以大声疾呼为宗旨，为民请命，故曰‘民呼’”。该报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反清革命的宣传。所以虽然报馆办在租界内，但还是受到清政府的压力，报纸屡遭封杀，到辛亥革命前，先后变换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个名称，由于三份报纸以“民”字打头，它们前赴后继，一脉相承，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竖三民”。

这三家报纸的背后关键人物始终是于右任。他是陕西三原人，中过举，但却和进入过翰林院的蔡元培一样，饱读诗书而不屑以为清廷效忠来求富贵，后来到日本募股办报，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他在上海办的“竖三民”成为革命党人的宣传阵地，批评清朝官吏贪污、暴虐，出卖民族利益，成为鼓动内地革命风潮的利器，赢得了“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声名。

于右任主持的这家报馆与南社之间有着密切而默契的合作，报上南社人的诗文影响了众多的读者，特别是在校的学生。包括正在读中学的顾颉刚和叶圣陶。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回忆说：“（南社）除了每年出一本选集之外，又和《民立报》合作，替这个报编副刊。这个副刊刊载的东西，有南社的诗、词，有苏曼殊的小说，有杨笃生、陈天华讲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上海的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学叶绍钧就在这报上抄下了许多心爱的诗词，作为

^① 柳无忌：《柳亚子文集》，第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他自己创作的模范。”^①

“竖三民”的创办几乎和南社的缔造同步,《民吁日报》创办于1909年,正是南社酝酿成型的时候,而《民吁日报》只存在了短短的48天,但却为南社的建立做了最好的宣传与见证,象征着南社诞生的几个最重要的文献都在《民吁日报》上刊载。

1910年10月11日,报纸改名为《民立报》,它仿佛就是革命浪潮的晴雨表,也成为辛亥革命的起居注。《民立报》馆里,从社长、主笔到编辑、记者几乎都加入了南社,共同从事反清宣传,向读者介绍共和、民主与人权的新理念。对此,柳亚子曾经回忆到:“这时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杀、暴动是家常便饭,另一部分是文的,便是所谓宣传工作了。文学是宣传的利器,诗文并重,效力很大。”“一纸新闻十万兵”,正是对南社中的新闻从业人员所起作用的形象说明。

除了《民立报》,当时南社人影响下的报章杂志还有:《江苏》(后改名《醒狮》)、《浙江潮》、《洞庭波》、《汉帜》、《鹃声》、《云南》、《晋乘》、《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

南社几乎囊括了辛亥革命前后一批革命报刊的创办者、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集中了当时的时代歌手,以诗文鼓吹革命,南社几乎可称“同盟会的宣传部”。

四、宋教仁: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灵魂

从张园雅集以后,南社决定吸收会员时采用填入社书,并且要有1~3位介绍人。

这个改革是柳亚子建议和推行的,起初并不顺利。最主要的创始人陈去病就认为填入社书是多此一举,坚持不肯再补填入社书。他填入社书不是亲笔书写的,而是别人代为填写。另外一个南社发起者高旭同样有趣,他在一张入社表上填上他和妻子何亚希的名字,介绍人一栏上就填上自己的名字。结果,陈去病在南社是第一号,高旭是第二号,高旭妻子何亚希排名第三号,而柳亚子作为3个发起人之一,无论如何也应该名列第三的。以入社书为基本依据,柳亚子等编辑了《南社社友通讯录》。

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人数为228人。社员入社年龄在21~30岁这个年龄段中人数最多,其次为31~40岁这个年龄段。单从年龄来看,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文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的职员通过他们的

^① 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第1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努力吸纳了一批名声显赫的社员加入,增加了南社的影响力与美誉度。柳亚子写道:“在通讯录出版以后,不久便是旧历廿九日黄花岗事件的发生,革命的情绪是很紧张的了,这时候,陈英士和宋渔父都已加入南社,而一方面又都是负着革命军中间重要工作的,于是南社也不免渐渐为人注目起来。”^①

柳亚子所说的陈英士就是陈其美,宋渔父就是宋教仁。他们都是同盟会中的关键人物,也是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人物。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的事务非常繁忙,怎么会有空参加文人的诗歌唱和呢?谁把他们带进了这样一个文学社团?

朱少屏是南社的元老。第一次苏州雅集就有他的身影,当时被推为会计员,后来几次雅集他都参与,出任过书记和庶务。说到文才,他在高手如云的南社社员中默默无闻,从1910年开始,南社开始编辑《南社丛刻》,共计编了22辑。诗文中很难发现朱少屏的名字,但对南社而言,他却是贯穿始终的重要人物。南社社友朱剑芒在其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南社》中甚至将朱少屏列为仅次于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的第四发起人。那么他在南社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朱少屏是上海人,曾去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回国之后,他最初和高旭一起创办健行公学,作为培养革命后备军的基地,后来还和于右任一起办《民呼》、《民吁》、《民立》等报。在柳亚子眼里,朱少屏是一个交际家,办事十分干练,最会拉拢,对他也非常好。在另外一位对南社了解颇深的郑逸梅的笔下,“少屏美风姿……西装革履,精通英文,办事又干练”。

南社创建后,朱少屏长期负责南社收支款项,印行刊物,联络宣传,大多由他包办,成了南社实际上的大管家。每次雅集请柬的发送,也归他负责,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圣手书生”。南社社员后来发展到数以千计,他接触最多,几乎都有联系,这点连陈高柳3位发起人都无法比拟,南社举行的18次正式雅集和4次临时雅集,他只缺席了4次。

翻阅南社的人社书,可以发现,在整个南社的历史上,介绍社友入会最多的按顺序排列是如下5位:柳亚子为187人、朱少屏为118人,蔡哲夫为116人,高旭为73人。4个人中,柳亚子、高旭列名发起人,在介绍社友方面名列前茅很自然。像柳亚子长时间负责南社的具体事务,在介绍人中能够名列第一是正常的。而位居第二位的便是朱少屏,他介绍的社员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力很大,比如在辛亥革命前后最为耀眼的革命巨子宋教仁、黄兴等都是由他介绍入会的。

1911年9月17日,江南开始入秋。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五次雅集,这

^① 柳无忌:《柳亚子文集》,第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时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不到一个月。参加雅集的社员达到 35 人,除了高旭、柳亚子、朱少屏、姚光、黄宾虹这些南社元老外,还来了几位首次参加南社雅集的新面孔:吕志伊、傅熊湘、陈其美,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宋教仁。这次雅集上,宋教仁被选举为文选编辑员。而文选编辑员这个称谓看似普通无奇,其实在南社的地位是最高的,相当于南社的社长。1909 年南社在苏州虎丘第一次雅集的时候,在南社发起人中影响力最大的陈去病就被推举为文选编辑员。

宋教仁于 1911 年 8 月 4 日在上海填写入社书。他的介绍人是朱少屏。此时的宋教仁 29 岁,在革命党人中已经是公认的才华横溢的核心人物。这位湖南桃源人是同盟会第二号领袖黄兴的密友,从 1904 年组建华兴会到 1905 年共同发起同盟会,他们之间一直进行着密切合作。但在同盟会发动的多次起义失败之后,宋教仁力主将发动革命的地域从以前的华南沿海转移到长江流域。

1911 年 7 月 31 日,也就是在加入南社之前 5 天,宋教仁和陈其美、谭人凤、吕志伊、于右任、居正等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宗旨是颠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在同盟会集中精华而遭遇重大牺牲的黄花岗起义之后,真正促成辛亥革命全面爆发的,却是新设立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总会日常就设在《民立报》馆里。宋教仁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同盟会中部总会代表了一个革命党——同盟会,南社代表了一个文学社团,而《民立报》是同盟会的喉舌,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一个党、一个文学社团和一家报社——《民立报》,成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三位一体,默契地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

对宋教仁这样一个革命党人中的翘楚入会,兴奋的柳亚子写了一首题为《赠渔父》的诗表达了喜出望外的心情:“桃源渔父是吾师,天遣逢君江水湄。”心高气傲的柳亚子对宋教仁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而宋教仁对南社很关注,绝非敷衍。他在入社的第二天就在《民立报》上写文章评点《南社丛刻》第四集,他赞美南社是以古典诗文会友的社团,南社社员多数为当代的名士。他评估说,南社的诗文“感慨淋漓,可诵之篇不鲜也”。忙碌于革命的宋教仁并非挂名社友,他写了诗文发表在《南社丛刻》上。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中部总会根据局势的发展调整了战略部署,考虑到武汉当时是全国瞩目的中心,决定由黄兴、宋教仁前往武汉,指导和协调全局,黄兴担任了武汉起义军的战时总司令,领导了关系辛亥革命全局的汉口和汉阳保卫战,宋教仁在炮火硝烟中冷静起草《鄂州约法》等,潜心为共和新政权建章立制。当革命高潮如汹涌的海潮呼啸而至的时候,立于风口浪尖上的宋教仁再也没有精力去履行南社文选编辑员的重任。

五、陈其美：光复上海与东南锁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负责南社日常事务的柳亚子收到有位署名“亦是同胞”的来信，书信是从苏州投到《民立报》馆并指明转交南社会计柳亚子的。这是一位知道南社底细的读者，他认为江苏巡抚程德全是汉人，如南社派胆大细心的人到巡抚衙门去游说，定能成功劝其反正。但南社的社员形形色色，如柳亚子本人就主要是从事编辑、撰稿的，纵横捭阖非其擅长。柳亚子写道：“这封信投到我书呆子手上来，自然是不生效力的了。不过，在上海方面担任实际工作的陈英士社友，却早在着手进行，和信上所讲的话也正是差不多吧。”^①

陈英士即为辛亥革命时期大名鼎鼎的陈其美，他是浙江湖州人，1911年2月18日加入南社，介绍人便是柳亚子。

早年，柳亚子曾进入蔡元培创办的中国教育会理化速成科，当时豪气干云，很想学习制造炸弹，对清廷大员实行暗杀威吓。陈其美比他早一年进理化科学学习，并由此起步，投身革命。此后，他短暂的一生都和炸弹、暗杀、暴动息息相关，颠覆了他外表儒雅的形象。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核心人物之一，陈其美的任务便是负责光复江浙沪等东南地区。当1911年10月底11月初，黄兴、宋教仁从武汉前线致电沪上告急时，陈其美等决定立即组织起义，其策略是“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这一着对辛亥革命大局极为关键。古人称长江为“吴头楚尾”，当时清政府派袁世凯率领北洋军企图扑灭武汉“楚尾”烈火，那同盟会就选择在财富之渊藪的东南动手，争夺“吴头”，让清廷首尾不能相顾。

陈其美是一个在上海滩关系深厚的革命者，和富商巨贾、帮会都有密切联络。人们知道他，是因为他以冒险犯难为乐，却不知道他喜欢诗歌书画的优雅一面，他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也爱称自己是书生。

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一手创办的洋务企业，专门生产枪炮，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正因为它是如此的重要，陈其美将占领这里当做起义的重点。

11月3日下午2时，小南门救火会联合会钟楼按预定信号先敲9响，再敲13响，声震上海，商团各部与各路敢死队数千人立即聚集南市九亩地，陈其美等宣布起义，当场扯毁清朝龙旗，升起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每人左臂缠白

^① 柳无忌：《柳亚子文集》，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布条,统称革命军。在起义的人员中,还有南社的女诗人、义葬秋瑾的同盟会员徐自华。

陈其美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武装,直扑江南制造局。起义人员中只有商团武器稍好,敢死队只有几支手枪、几十把刀枪和一些炸弹,几经冲锋,死伤30多人,敢死队长张承樞、刘福标也负伤。一时难以攻克。激战到傍晚,制造局内出来一个雇员,要求起义军派代表入局交涉。这时,陈其美展现了冒险家的天性,他孤身进入江南制造局,想劝说对方投降,但结果是他被扣押了。幸亏援军后来很快赶到,占领了江南制造局。

当人们找到陈其美时,只见他被脚镣手铐锁着,坐在一条凳上,头紧贴板壁,一动不动。原来他的发辫从新凿的壁孔穿过拉出房外,吊在一个铁钩上。等到救起,已经手足麻木,不能行动,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屈的革命者,也是一个为理想而不惜献身的受难者。

11月4日黎明,上海光复。在随后举行的成立上海军政府的联席会议上,南社的社员朱少屏向与会者称颂陈其美攻克江南制造局的功绩,陈其美在和其他人的竞争中胜出,被推为沪军都督。因为这个位置,他推动江浙两省光复,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成为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关键人物。后来,孙中山谈到辛亥革命时对陈其美极为赞赏,他说:“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东南半壁,君实锁钥。”对陈其美这个至今毁誉参半的人物,柳亚子评价道:“英士生前,上海舆论颇攻击之,余独左袒甚力。所见与孙中山先生略同,自谓惟巨匠乃能识英雄耳。”^①

六、张默君:参与苏州光复的南社女诗人

苏州,清代是江苏巡抚衙门的所在地。上海于11月4日宣布独立,与上海临近的苏州,也正积极酝酿光复。陈其美派人到苏州推动独立,而在苏州本地,南社女社员张昭汉正帮助他的父亲张通典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推动江苏独立。

张昭汉父亲张通典在女儿降生时以光大汉族之意,为女儿取名“昭汉”。1905年7月,上海女界在广西路榕庐召开抵制美货大会,当时正在务本女塾读书的张昭汉登台演说,号召妇女不购美货。同盟会成立不久,她加入同盟会,与秋瑾、唐群英等9人一起成为同盟会最早一批女会员。秋瑾、徐锡麟等在秘密举义的过程中,都与她联络。秋瑾被捕前留下一封短信:“访妹未遇,至怅,行色匆遽,再见何期?前途珍重!”10天后,秋瑾就在轩亭口就义。

^① “柳亚子自撰年谱”(1940),《柳亚子文集》,第16页。

武昌起义之后，正在上海圣约瑟女子书院文科读书的张昭汉，赶回苏州家中，并敦促在广西柳州的父亲归来。4日深夜，陆军标统朱熙、督练公所科长章驾时、水师管带王道煌，以及苏州各界人士百余人，在葑门护龙街饮马桥张通典寓所秘密集会，策划光复苏州。张昭汉也列席参加。

会上，张通典提出将“兴汉灭满”改为“兴汉安民”，防止出现对无辜满人的过激行为。张昭汉首先赞同，她当场表示要舍弃“昭汉”的原名，以字为名改叫“张默君”。

张默君连夜扯了一幅二丈余长的白布，用布帚蘸墨汁书写“兴汉安民”4字，差人悬挂于北塔寺塔顶，并和弟妹们一起制作书写着“兴汉安民”字标的布条若干，发给起义民军缠在臂上。考虑到苏州宣布独立后，需要一方“江苏都督府”印，各方一时来不及准备，张默君还把自己使用的砚台翻过来，在背后刻字为印。

张通典等人讨论后决定，逼迫程德全立即宣布独立，由朱熙等率新军，张通典率民党，张昭汉等率民众代表，凌晨齐集进城，以势相迫，争取兵不血刃光复苏州。

1911年11月5日拂晓，父女俩与水陆将领，率领马队、步兵、军警、上海民军和苏州各界人士浩荡进城，沿街布岗，大队涌向巡抚衙门。

江苏巡抚程德全由梦中惊醒，张通典等晓以大义，程德全连声说“谨受教，谨受教”，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接受了都督大印，当天宣布江苏独立。

苏州阊门观前街各街店，都高悬“兴汉安民”白旗。上海的革命党同志龚铁铮等乘车经过苏州，远远看到北寺塔上“兴汉安民”大旗，在蓝天白日下迎风招展，都肃然起立，兴奋地说：“这是张默君的手笔，苏州光复了！”

光复苏州的宣言布告是张默君起草撰写的。

“照得民军起义，实为顺天应人。满清窃据中国，惨经三百余春；迭遭丧权割地，近尤逆施倒行。吾族炎黄华胄，焉能忍辱偷生？武汉义旗既举，争看薄海欢腾。吴会长江重镇，指日铙吹收京。望尔四民人等，各安所业勿惊；如有乘机扰乱，定当执法以绳。一德兴汉安民，同开万世太平！”这是富于南社风格的文字，沿袭古典文体的形式而装进新的内容。

程德全看了以后对张默君的文才大加赞赏，立即任命她为《大汉报》社长兼总编辑，社址设在沧浪亭之可园。创刊号上刊出南社同人《贺词》：“驱逐鞑虏，弘我汉京，振臂一呼，万户响应！”南社的发起人陈去病也成为该报的撰稿人。他在发刊词中大声疾呼：“革命哉！革命哉！二十世纪之中国，真我黄帝子孙发扬蹈历之时日哉！而吾苏之民诚苏矣。”革命的文字让许多浑浑噩噩的国民惊醒过来，追踪并呼应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暴。